

明代的济南府城,不仅是山东布政司署、济南府署和历城县署等三级行政机构的驻地,明成化后更成为德王就藩之地。

第一代德王朱见澐,为明英宗朱祁镇的第二个儿子,成化三年(1467)就藩于济南。据崇祯《历城县志》记载,德王府“居会城中,占十之三”,为当时济南城中最大的建筑群。在济南的德王世系庞大,德王(亲王)共承袭七代,德王子孙中郡王共分封了十五个,其下镇国将军、辅国将军、奉国将军、镇国中尉、辅国中尉、奉国中尉等爵位封授,则不计其数。

在一般人眼里,德王家族生活奢侈,巧取豪夺,在供应与役使上加重当地人的负担,对地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。当代史评往往以“寄生虫”、“毒瘤”等称之。

其实,德王家族也并非一无是处,在驻藩济南的170多年中,历代德王曾新建或重修了千佛山寺院、北极庙、碧霞宫、太平寺、后宰门关帝庙、星宿庙、火神庙等众多名胜古迹,部分建筑保存至今;此外还刊刻了《前汉书》、《云庄乐府》、《儒门事亲》、《张文忠家训》、《张文忠诗集》等古籍传世,对济南的建筑艺术和文化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。最可贵的是,在明末抗击清军侵略的“济南保卫战”中,末代德王家族中多位成员,浴血奋战,与济南百姓并肩抵抗清军侵略,最后壮烈牺牲,践行了“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社稷”的明代帝王贵族价值观,捍卫了朱明家族的荣誉。

明末“济南保卫战”,是济南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一次守城之战。因此次战役发生在戊寅己卯之间,岁末年初之际,史称“戊寅之变”或“己卯之变”。崇祯十一年(1638年戊寅)冬,十万清兵越长城大举南下,至大军围逼济南城下时,正值腊月二十三小年夜,此时,巡抚颜继祖已奉命领兵移防德州,城内只剩乡兵五百和莱州援兵七百,双方兵力悬殊,以山东巡按御史宋学朱、山东左布政使张秉文、济南知府苟好善和历城知县韩承宣等驻城文官为首,领导济南城内士民上演了可歌可泣的“济南保卫战”,与攻城清军激战九昼夜,正月初二济南城破,宋学朱等官员全部壮烈牺牲,济南守城士民死亡无数。

除了守城殉国的宋学朱等官员外,济南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刘敕(历城最早



▲原德王府正殿。



▲崇祯《历城县志》。

济南德王府的兴衰

□陈强



明府城史话

投稿邮箱:lixiazuoxie@163.com

县志《历乘》编著者)、刘檄兄弟,在此役中不屈而死,家人皆被杀;西关回民在陈、金二教长的带领下保卫西关,战死二百余人,巡守四城的秀才战死三百五十二人;城内妇女为避免城破被辱,“溺明湖者数万人,投井自缢者半之”。

关于这场战役中济南城中的死亡人数,并没有明确的说法。据《明实录·崇祯实录》记载,山东巡按御史郭景昌事后“瘞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余”,另据蒲松龄《聊斋志异·鬼隶》中侧面记述:“北兵大至,屠济南,扛尸百万”,而崇祯《历城县志》描述战役之惨烈:清兵“焚杀官兵绅弁数十万人,踞城十有四日乃去。家余焦壁,室有深坑,湖井充塞,衢巷枕藉。盖千百年来未有之惨也!”

德王府在这场惊天之变中当然也是无法独善其身的,整个德王家族被卷入这场战争旋涡中,几乎消失殆尽。除了德王朱由枢被清兵掳走外,德王家族

中至少还有八位宗亲在守城战斗中牺牲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,按当时的明朝律令制度是严禁藩王及宗室参与军政之事的,也就是说,德王家族虽“依法”享有从封地获得财富的权利,却没有对封地的守土之责。不过,仍然有德王宗室冲破藩禁,置生死于不顾,与济南百姓并肩战斗,最终城破殉国。乾隆《历城县志》记载了四位有爵位德王家族死难者,分别是守南城的宁海王朱常沔、泰安王府奉国大将军朱常滂、临朐王府奉国将军朱常溱,另据民国《续修历城县志》记载,死难者还有仪宾(德王女婿)陈凤仪一家,陈凤仪与儿子陈正学、陈正己、侄子陈推心奉命守东门,城陷后皆被害。后来家人收殓陈凤仪的尸体时,只剩下没有头颅的尸身。

德王家族享受济南百姓衣食供养一百七十年,最终与济南百姓一同将热

血洒在济南城头,也算是死得其所。朱常沔等四位宗室死难者,与其他“己卯之变”中死难的有姓名可考者,后来都被供奉在县学外的忠孝节义祠中。忠孝节义祠中,有王族贵胄,有义社生员,有回族教长,有守寨村民,有官兵、有士绅,有老者,有妇孺。但奇怪的是,这里却没有任何一个德王府护卫或侍从的名字,更不要说什么“德王驾前带刀侍卫”了。

“济南保卫战”后没过几年,明朝便灭亡了,德王府成为废墟,清康熙年间山东巡抚在德王府遗址上兴建了巡抚署,规模较德王府有所缩小,原德王府西北部的后花园被划到巡抚署外,后逐渐被流民所占,形成后来的王府池子街等市井民居。旧时的繁华早已不见,也只有王府池、后宰门、玉斌府(仪宾府)街、东华街等地名中,还能依稀想见当年王府的辉煌。



▲清康熙年间,在德王府旧址建巡抚署,将濯缨湖西部划出,因曾在王府内,民间素称之为“王府池子”。

【城市记忆】

□黄鸿河

每次路过天桥,八里桥便会想起当年“拉套子”的哥们,便会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行话“挂吧?挂吧?”和一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穷孩子蜂拥在地排车两边,渴望被雇的眼神。

如今的年轻人已经很少有人知道父辈们拉套子是怎么回事了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在济南的大街小巷,生活着近万名靠拉套子谋生的少年,为了养家糊口,小小年纪就开始像牛马一样干活。他们是生活在特殊年代的“打工仔”,是生活在艰苦岁月中的“包身工”,是在人生刚开始憧憬便被迫切拼命工作的小男子汉。

那时正是“文革”时期,大批“老三届”学生面临中学不毕业,大学不招生,工作不分配的窘境,只能滞留在学校,造成学生只进不出,人满为患。很多贫寒家庭实在难以应付“半大小子,吃死老子”的现实。怎么办呢?

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年代,国营煤建公司、铁路货场、济南面粉厂、建材厂等一大批煤炭、面粉、建筑材料等需要调拨到城市的四面八方,这就为运输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,当时主要运输工具是地排车,以及拉大型货物的大胶皮车。

济南煤建一公司地处八里桥北,地排车运煤需翻越八里桥;济南铁路局货物物资运输则要走经一路翻越天桥、成丰桥;济南面粉厂在经一纬九路,转运粮食到经四纬六路粮库在经一溜上坡(济南话“上沿儿”),一个人拉一吨货物平道尚可,但要爬坡上桥就力不从心了。

车夫们最早是舍不得雇拉套子的,每

难忘“拉套子”的哥们

到桥头上坡,三两个车夫就要把车停下,轮流“盘车”往上拉。所谓盘车,就是互相帮助,走S形把地排车拉上去,虽然这样能省下几个小钱,但很耽误活,如果是单车就傻眼了。正是这种机会,给家境贫寒又失学的穷孩子们提供了“拉套子”的商机。天桥、八里桥、三孔桥,济南面粉厂的“有利”地形便成了拉套子最集中的地方。

先说天桥拉套子的,工具是一根三米长的套子绳,由三部分组成:黄麻绳、挂车钢钩、挎肩U形板带。大伙一般把套子绳系在腰间或搭在肩上,手里不停地摇动钢钩,看到地排车,问一句“职业行话”：“挂吧?挂吧?”价格是透明的,从天桥南头拉到成丰桥每趟一毛钱。因为干的人多,竞争激烈,多数时候每天只能挣几毛钱。当时羊肉每斤0.49元,两毛钱能买一大盆西红柿。

再说八里桥,这地方主要是拉煤的多。走八里桥要过两座铁路桥,一条铁路通煤建公司,一条铁路通济南铁路大厂。拉这两座桥上坡也是一毛,如果再往南拉到五里牌坊是两毛。这边拉套子哥们的行话是“雇吧?雇吧?”

天桥、八里桥、三孔桥拉套子的多是短工。好处是随意自由,爱干不干;坏处是活路不稳,票子挣得少。

我的仁兄张俊一从11岁就开始在天桥拉短套,因为个子小,别人拉一趟天桥挣一毛,他拉一趟只能得五分,有时在后面帮着推车,只给三分,他后来成为济南一家工厂的厂长。

说起拉套子还有一段趣闻,是套子哥贾庆华亲历的:全国摔跤冠军,一代跤王谭

树森,在那个年代也要拉地排车养家糊口,他虽然力气比别车夫大,但爬天桥也要雇套子,套子哥们都愿意拉他的车,为的是跟他套近乎,学两招摔跤的功夫。

谭树森一般拉过成丰桥,在路边找块泥巴地,随便抓住一个“小末子”,嘴里喊着“这招叫大别子”,“啪”一脚摔出一丈多远,随后跟上一句,“一脚一毛,这趟套子钱顶了。”说罢便扬长而去,套子哥虽没得到一毛钱,但跟跤王撸了一脚,心里还是美滋滋的。

济南面粉厂门前拉套子的多是长工,他们被车夫长期包下,每天一块钱,歇雨工也有份,但工作量很大。

我的另一位仁兄吴立远14岁在八里桥拉短套,16岁开始在面粉厂拉长套。每天拉10趟面粉,一趟40袋整一吨,送到经四纬六路粮库。自己装自己卸,120斤重的身体扛4袋200斤重的面粉,每天一个人装卸800袋。小小年纪正是长身体的时候,为了谋生不得不起早贪黑,不少人后来落下了腰疼的毛病。中午吃饭是三个自带的棒子面窝头,一块水萝卜咸菜,外带一军用水壶白开水,一天活干下来累得腰酸背疼,手上的老茧足以割下几层皮。

另外,还有一大批是转悠在大街小巷的散套,甭管砖瓦石灰,只要车夫需要,麻利挂钩走人,边走边议价格。



▲20世纪50年代的天桥。

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,拉套子哥们基本上都失业了,为什么呢?

一个是老天桥1972年进行改建,桥下两边开通了马路,地排车再也不用“盘”天桥了。

再一个是出现了新型运输工具机动三轮车,它的出现,基本上剥夺了地排车的用武之地,拉套子自然也就没有了市场。失业的拉套子哥们,少数人参加了工作,多数人响应党的号召,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炼起了红心。

拉套子哥们是艰难困苦的一代,他们经历了太多的坎坷,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,经历了“文革”的暴风骤雨,经历了上山下乡战斗地,经历了争取返城酸咸苦辣,经历了改革开放,经历了下岗失业创业,终于熬到了退休,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

正如拉套子哥孙兄所言:一段经历,一片情怀,一丝酸楚,一个时代。

如今,已步入老年的拉套子哥们,非常渴望80后的孩子们“理解我们的过去,为我们的经历点个赞,喝个彩”!